

大學人文

夏中义 丁东 主 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第5辑

智效民 蒋梦麟怎样当北大校长

丁国强 九议大学精神

李新宇 「覆孔孟」：意欲何为——《叩问陈独秀》之第三章

邵建 中国自由主义的「落日余晖」

钱理群 王瑶怎样当北大教授

何毓琦 中国学术失范的原因及实例——一位外籍院士写给中国工程院院士宋健的信

大學人文

清園王元化



第 5 輯

DAXUE RENWEN

夏中义 丁 东 主 编
谢 泳 邵 建 副主编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学人文. 第5辑 / 夏中义, 丁东主编.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5

ISBN 7-5633-6012-3

I. 大… II. ①夏…②丁… III. 人文科学—高等学校—课外读物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37101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 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桂林金山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 541100)

开本: 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 12.25 字数: 225 千字

2006 年 5 月第 1 版 200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5 000 册 定价: 22.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独立评论]

- 2 **智效民** · 蒋梦麟怎样当北大校长
21 **丁国强** · 九议大学精神

[知识生活]

- 38 **智 量** · 一本书与一个国家的命运
51 **孔祥骅** · 幽谷铁窗:我的“知识生活”
64 **程巢父** · 《静生生物调查所史稿》序

[沉 钟]

- 74 **李新宇** · “覆孔孟”:意欲何为?
 ——《叩问陈独秀》之第三章
94 **邵 建** · 中国自由主义的“落日余晖”

[观 察]

- 116 **张蕴艳** · 与《大学新语文》在一起的日子
124 **夏中义** · 上海交大“大学人文”课程年度试卷四种
129 **赵明节** · “大学人文”责编纪事(三)

[新青年]

- 146 **唐 馨** · 寻找自我情思的真实出发点
152 **何佳音** · 一边凌迟,一边梦想
155 **王 颖** · 学医:为自己作一次选择

[我的大学]

- 158 **钱理群** · 王瑶怎样当北大教授
174 **述 弢** · 倒行人生路
 ——哭泣的青春(之二)

[读本新选]

- 184 **何毓琦** · 中国学术失范的原因及实例
 ——一位外籍院士写给中国工程院院士宋健的信
188 编后语暨稿约

蘇楚蘭志料北大對

周文輝 著



蘇蘭志料北大對，是一個關於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文獻。它不僅記錄了中國近代史的變遷，也反映了中國近代史的變遷。蘇蘭志料北大對，是一個關於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文獻。它不僅記錄了中國近代史的變遷，也反映了中國近代史的變遷。蘇蘭志料北大對，是一個關於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文獻。它不僅記錄了中國近代史的變遷，也反映了中國近代史的變遷。

周文輝 著

蘇蘭志料北大對，是一個關於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文獻。它不僅記錄了中國近代史的變遷，也反映了中國近代史的變遷。蘇蘭志料北大對，是一個關於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文獻。它不僅記錄了中國近代史的變遷，也反映了中國近代史的變遷。蘇蘭志料北大對，是一個關於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文獻。它不僅記錄了中國近代史的變遷，也反映了中國近代史的變遷。

[獨立評論]

DULI PINGLUN

蘇蘭志料北大對，是一個關於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文獻。它不僅記錄了中國近代史的變遷，也反映了中國近代史的變遷。蘇蘭志料北大對，是一個關於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文獻。它不僅記錄了中國近代史的變遷，也反映了中國近代史的變遷。蘇蘭志料北大對，是一個關於中國近代史的重要文獻。它不僅記錄了中國近代史的變遷，也反映了中國近代史的變遷。

1931年，蘇蘭志料北大對，在上海出版。

1931年，蘇蘭志料北大對，在上海出版。

蒋梦麟怎样当北大校长

■ 智效民

在北大的历任校长中,蒋梦麟是在职时间较长的一个。关于他的贡献,傅斯年曾有评断:蒋梦麟的人格魅力不如蔡元培,学问不如胡适,但办事却比他们高明。对于傅斯年的看法,蒋是认可的,但同时他又开玩笑地说:“所以他们两位是北大的功臣,我们两个人不过是北大的功狗。”^①蒋梦麟为什么会成为所谓的“北大的功狗”(其实也是北大功臣)呢?这与他的早年经历、教育思想和在北大的所作所为有关。

早年经历

1. 兴趣与理想

蒋梦麟,字兆贤,号孟邻,1886年1月20日生于浙江余姚蒋村。出生时,他父亲梦见一只熊来到他家,便给他起名“梦熊”。后来他在浙江高等学堂闹学潮,被列入黑名单,才改名“梦麟”。

蒋梦麟的祖父在上海开过钱庄,是个比较成功的商人。他的父亲是当地绅士,喜欢发明创造,曾经仿照西洋模式盖过一座洋楼,还造过一艘轮船。楼是盖成了,但造轮船却因知识浅薄而失败。因此,他“一心一意要让他的儿子受现代教育,希望他们将来能有一天学会洋人制造神奇东西的‘秘诀’”^②。

蒋梦麟5岁多就进了私塾,由于痛恨死板的读书生活,曾逃学回家,并发誓要杀先生、烧毁私塾。对于小孩子的这种恶作剧,他的继母和先生都没有当真。这也可以看出,当年的人们在教育孩子时,心态非常从容。

尽管没有挨打,但蒋梦麟还是回到私塾,继续那苦不堪言的读书生活。他

① 《现代世界中的中国》,192页,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② 《西潮·新潮》,40页,长沙,岳麓书社,2000。

说：“在最初几年，家塾生活对我而言简直像监狱，唯一的区别是：真正监狱里的犯人没有希望，而家塾里的学生们都有着前程无限的憧憬。所有的学者名流、达官贵人不是都经过寒窗苦读的煎熬吗？”正因为这样，他才能忍受监狱似的煎熬。他还说，如果没有“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名言警句的激励，他早就跑到上海经商去了。因此他认为：“理想、希望和意志可以说是决定一生荣枯的最重要因素。教育如果不能启发一个人的理想、希望和意志，单单强调学生的兴趣，那是舍本逐末的办法。只有以启发理想为主、培养兴趣为辅时，兴趣才能成为教育上的一个重要因素。”^①

平心而论，蒋梦麟最初的理想还是属于传统社会的一种个人奋斗，但这种个人奋斗是与国家社会联系在一起的。儒家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在《任鸿隽与四川大学》一文中，曾经引述陈衡哲对女儿任以都说过的一段话，其中也谈到这个问题。她说：“我们那一代人出国留学，都有一个理想，就是学成归国，要为国家、人民尽点心力、做点事。你们这一代却根本对公众的事没有什么理想，只愿念个学位，找份好差事，这算什么？”当年任以都因为思想激进，一再痛骂士大夫祸国殃民。但陈衡哲对她说：“你知不知道士大夫阶级为国家人民做过多少事？真正的士大夫，处处为国家、人民着想，从不考虑个人利害，这样过一辈子才算是有意义的。”直到晚年，任以都对母亲的这番话还记忆犹新，她说：“他们那一代，不但开辟了很多新路径、新园地，为日后中国的发展打下良好的基础，也满怀崇高的理想与抱负，一心要为国家人民贡献心力。”^②蒋梦麟比任鸿隽夫妇略大几岁，士大夫气质在他身上也有明显的表现。

2. 思考与研究

据蒋梦麟说，他的童年教育有三个来源：一是念古书，二是听故事，三是观察大自然。这些经历养成了他的观察力、好奇心和理解力，再加上他喜欢思考、讨厌死记硬背，这才有后来的成就。12岁以后，蒋梦麟先后在绍兴中西学堂、上海南洋公学和浙江高等学堂求学，并于18岁考中秀才。在绍兴中西学堂时，蔡元培正好是那里的“监督”（相当于校长）。没想到十几年以后，他居然会协助蔡元培主持北大。

南洋公学对蒋梦麟的影响也很大。该校是交通大学的前身，开办时采纳了美国传教士福开森的意见，一方面实行斯宾塞倡导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原则，一方面开设国学、西学课程。国学课程以《四书》和宋明理学为主，西学课程则包括西方的历史文化和新兴科学知识。蒋梦麟在这所学校不仅认识到研究学问必须有强健的体魄，还开始对中外道德进行比较研究。他说：“每当发现对某些问题的中西见解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时，我总有难以形容的喜悦。如果

^① 《西潮·新潮》，31页。

^② 《任以都先生访问纪录》，120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

中西贤哲都持同一见解,那么照着做自然就不会错。当发现歧见时,就加以研究,设法找出其中的原因。这样就不知不觉地做了一项东西道德行为标准的比较研究。这种研究工作最重要的结果是……对于如何立身处世开始有了比较肯定、比较确切,也比较自信的见解,因为道德观念是指导行为的准绳。”他还说,通过比较研究,他开始学会思考,学会用自己的理智来判断是非,这样一来,传统信仰就再也不能左右他的思想行为了。他说这是自己“思想上的一次大解放,像是脱下一身紧绷绷的衫裤那样舒服而自由”。从此,蒋梦麟开始认识到要救国必须先救自己。于是他“决心努力读书,努力思考,努力锻炼身体,努力敦品励行”。^①他觉得这才是儒家所谓修身的正确途径。

从蒋梦麟的经历中,我们可以发现,思考是研究的起点,研究是思考的继续。好的教育就是要培养学生思考和研究兴趣,应试教育却要求学生死记硬背现成的知识,根本不需要他们怀疑、思考和研究。这其实是在扼杀学生的天赋与智慧。另外,许多人把研究看得过于神秘,以为那是专家学者的事,这也是认识上的一大误区。记得蔡元培在就任北大校长时说:“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②如果说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话,那么,中学和小学研究一点低级粗浅的学问总可以吧。有了这种认识,才能改变死记硬背的应试教育模式。

3. 育物与育人

蒋梦麟22岁时曾经去日本参观,深感教育的普及是日本跻身于世界强国之列的主要原因。第二年他赴美国留学,在“以农立国”思想的指导下选择了农学。一位朋友对他说:农学固然重要,但还有别的学科对中国更重要。换言之,“除非我们能参酌西方国家的近代发展来解决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否则农业问题也就无法解决”。这种见解对于解决现在的“三农”问题是个很好的参照。这位朋友还说:如果不改学社会科学,你的“眼光可能就局限于实用科学的小圈子,无法了解农业以外的重大问题”。^③ 蒋梦麟从小生活在农村,对大自然有浓厚的兴趣,但听了这些话以后,他开始动摇了。正在这时,他下乡实习,看到一群活泼的孩子去上学。这情景也许触动了他的童年记忆,让他突然觉得与其研究如何培育植物,不如研究怎样培养人才。于是他决定放弃农学,改学教育。这样一来,他的兴趣也更加广泛,选读的书籍扩大到历史、哲学、文学、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这种因为理想、兴趣而导致的专业改变,与鲁迅、胡适的情况颇为相似。

在美国,他的兴趣仍然集中在东西方文明的比较研究上。在研究过程中,他喜欢用中国的尺度来衡量欧美的东西,这使他发现希腊文化及其自由教育在西方现代文明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认为这种方法其实就是利用旧知识来获

① 《西潮·新潮》,67页。

② 《蔡元培全集》,第3卷,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4。

③ 《西潮·新潮》,77页。

得新知识的过程。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举例说:如果一个孩子从来没有见过飞机,我们可以对他说飞机就像一只鸟,或者像一只长着翅膀的船。假如这个孩子连鸟和船也没见过,要让他了解飞机就困难了。同样的道理,要想让中国学生了解西方文明,最好的办法就是与中国文化进行比较。因为“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愈深,对西方文化的了解愈易。根据这种推理,我觉得自己在国内求学时,常常为读经史子集而深夜不眠,这种苦功总算没有白费,我现在之所以能够吸收、消化西方思想,完全是这些苦功的结果”^①。这也提醒我们,改革开放后大量出国的留学生之所以对西方文化缺乏了解,也无法与20世纪初的欧美留学生相比,主要是因为他们经历了十年“文革”,对中国传统文化缺乏应有的了解。

说到这里,蒋梦麟想起小时候读过的《幼学琼林》。他说这是一本启蒙读物,它不仅押韵,内容也非常广泛,从天文、地理、草木虫鱼,到商业、农业、科学发明,甚至政治哲学,几乎无所不包。记得胡适在《四十自述》中也提到这本书,说这本书很有意思。最近我在旧书市上看到了这本书,版本很多,可见它是一百年前中国社会转型时期影响很大的一本书。

教育思想

1. 体育与美育

蒋梦麟初到美国,就读于卜技利(伯克利)的加利福尼亚大学。该校环境优美,课余生活也很丰富。“离剧场不远是运动场,校际比赛和田径赛就在那里举行。青年运动员都竭其全力为他们母校争取荣誉。……‘健全的心寓于健全的身’——这就是古希腊格言的实现。”另外,校园的一个大门上有许多栩栩如生的男性裸体雕像,图书馆阅览室里也有希腊女神的裸体塑像。蒋梦麟初次看到这些雕塑,心里非常疑惑,不知道“为什么学校当局竟把这些‘猥亵’的东西摆在智慧的源泉”。后来他听到一位伦理学教授说,“让女学生们多看一些男人的裸体像,可以纠正他们忸怩作态的习惯”,才明白“完美的思想寓于完美的身体”^②。

在美国,他还逐渐认识到“美是希腊做人的中心点”,正因为这样,希腊才产生了美学和许多伟大的美术作品,从而使希腊文明成为西方近代文明的基础。因此,把体育和美育结合起来,让它们齐头并进,使受教育者的身心得到全面发展,才是教育的真谛。这也是蔡元培主张用美育代替宗教的主要原因。

从加州大学毕业后,蒋梦麟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师从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教授。关于实用主义,他记得老师最有名的一句话是:“一件事若过于注重实用,就

^① 《西潮·新潮》,81页。

^② 《西潮·新潮》,82页。

反为不切实用。”^①哥伦比亚大学位于纽约市中心,因此他经常到乡下度假。他发现在乡下住久了,回到城市就有一种愉快;在城市住久了,到了乡下也会感到清新可爱。这是因为环境改变会引起心理变化,用现在的话说,大概就是所谓“审美疲劳”吧。

1917年蒋梦麟学成回国后,在商务印书馆担任《教育杂志》编辑和《新教育》杂志主编。在此期间,他发表了大量文章,集中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他在一篇文章中说: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天赋与秉性之中,教育的目的就是尊重这种价值,让每个人的特性发展到极致。智育、体育和美育的作用,就是要使“我能思,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思力至其极。我身体能发育,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体力至其极。我能好美术,则极我之能而培养我之美感至其极。我能爱人,则极我之能而发展我之爱情至其极”。他还说,只有达到这个目的,人类社会才有自由、平等、民权、共和、选举权、代议制和言论自由等制度设计。否则,统治者就会“视万民若群羊,用牧民政策足矣。何所用其‘言论自由’?何所用其‘选举权’乎”^②。

蒋梦麟认为,蔡元培之所以提出以美育代替宗教,是因为“蔡先生的思想中融合着中国学者对自然的传统爱好和希腊人对美的敏感,结果产生对西洋雕塑和中国雕刻的爱好;他喜爱中国的山水画,也喜爱西洋油画;对中西建筑和中西音乐都一样喜欢。他对宗教的看法基本上是中国人传统见解,认为宗教不过是道德的一部分。他希望以爱美的习惯来提高青年的道德观念。这也就是古语所谓‘移风易俗莫大于乐’的传统信念。高尚的道德基于七情调和,要做到七情调和则必须透过艺术和音乐或与音乐有密切关系的诗歌”^③。

2. 教育与和平

蒋梦麟留美期间,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因此他对战争与和平有过深入的思考和体会。1919年,他曾撰写《和平与教育》,其中涉及教育的本质等问题,可以视为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

文章开门见山地说,所谓和平,是正义的同义词。有正义就有和平,倘若正义扫地,虽然没有战争,也不是和平,而是一种苟且偷安。从这个角度来看,统治者标榜的我国人民素以爱好和平著称,其实是为“所谓牧民政治”开脱。因为在专制制度下,老百姓仅仅是一群羊:羊肥了,牧人就会杀而食之,于是出现暴政;暴政日久,必然导致羊瘦,于是牧人就继续放牧,推行仁政。这就是中国历史一治一乱的根本原因。

蒋梦麟认为,要改变这种“羊肥而食”、“羊瘦而牧”的循环,就必须推行民主政治。他指出,牧民政治的反面是平民主义政治或曰民权主义政治。这种政治

① 《新潮·新潮》,92页。

② 《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6~7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1。

③ 《新潮·新潮》,119~120页。

的目的是要增进平民的能力和知识,使每一个人都养成健全的人格。只有这样,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和平才有真正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中国和俄国,是因为中俄两国没有平民主义的民主政治。德国向世界宣战,最终归于失败,也是因为它的政治制度没有美国和其他协约国优越。因此他认为“强国之道,不在强兵,而在强民。强民之道,惟在养成健全之个人,创造进化的社会”;所谓教育,就是为了“达此和平目的之方法也”。^①

他还指出:中国的教育,是牧民政治的教育。要改为平民主义教育,必须从三个方面去努力:第一,要“养成独立不移之精神”,改变过去那种萎靡不振、依赖成性的恶习;第二,要“养成健全之人格”,改变以往“好学者读书,读书愈多,而身体愈弱”的传统;第三,要“养成精确明晰之思考力”,改变平时“凡遇一事,或出于武断,或奴于成见,或出于感情”的毛病和喜欢用“差不多”来判断事物的习惯。^②

在这篇文章中,蒋梦麟还分析了中国社会进步应该采取的三项措施:一要改良起居;二要修筑道路,振兴实业;三要奖励并推进学术。他认为前两项属于物质方面的改良,比如生活在臭水沟和猪圈里的孩子,只能是“皮黄骨瘦,精神疲倦,做事萎靡”;后一项则属于精神领域的进步。他说:“学术者,一国精神之所寄。学术衰,则精神怠;精神怠,则文明进步失主动力矣。故学术者,社会进化之基础也。”^③但是,由于我国在学术方面历来有漫无系统、重视应用、专重古文等三大弊病,致使学术研究不是出于兴趣,而是为了应用。这种主次颠倒、源流混淆的做法,遏制了学术的创新能力。

为了进一步说明如何才能推动学术进步,蒋梦麟还把经商和做人相比:“夫对于金钱不忠实,不可以为商。对于行为不忠实,不可以为人。对于知识不忠实,其可以言学术乎?”^④因此,“欲求学术之发达,必先养成对知识的忠实”,而养成对知识的忠实,是做学问的最基本的要求。胡适所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也是这个意思。

在文章的结尾,蒋梦麟总结道:“……以正义为先导,以养成健全之个人进化的社会为后盾,张旗鸣鼓,勇猛前进,此即所谓为和平而战也。战而胜,则平民主义由是而生存,真正和平由是而永葆。和平与教育之关系,如是如是。”^⑤

3. 职业与文化

蒋梦麟留学归来,刚好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倡导职业教育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面对这一思潮,蒋梦麟非常冷静。他认为职业教育固然需

① 《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9~10页。

② 《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11~13页。

③ 《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15~16页。

④ 《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17页。

⑤ 《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17~18页。

要,但如果以为除了职业教育之外就没有其他教育,或者说所谓教育就是职业教育,那就大错特错了。

为了纠正这种错误认识,他写了《教育与职业》、《职业教育与自动主义》等文章。他指出:教育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国家有问题,故有国家教育。社会有问题,故有社会教育。个人有问题,故有个人教育。职业有问题,故有职业教育”。如果有关问题不能解决,那就是教育的失败。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职业教育,不过是教人“操一技之长而借以求适当之生活也”。但一个国家或一个社会在职业问题之外还有许多问题,它们最终还需要通过文化教育来解决,这就是普通学校应该承担的功能。因此职业教育并不是教育的全部,而是其中一部分。所以他认为:“学校非专为职业而设,举学校而尽讲职业教育,则偏矣。”^①

对于类似的偏颇,蔡元培也多有提醒。比如1920年10月,蔡先生应《法政学报》的邀请,为该学报创刊一周年致词说:“从前法政大学,大抵都是用一种官僚教育、职业教育。他们的旨趣,就是要学生不请假,把讲义背得熟,分数考得好,毕业后可以谋生便罢了。”他认为这种“职业学校,是专为毕业以后得饭碗的,确无研究学理之必要”。如今办《法政学报》至少有三个好处:第一,可以提高学生研究学理的兴趣;第二,可以引发学生求新的思想;第三,可以使学生养成“非自利的公德心”。所有这些,都有利于摆脱“职业教育的恶习”。^②随后,他赴欧洲考察,途经新加坡参观一所中学时,又作了题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讲演。他说,职业教育好比房屋,普通教育好比地基,倘若等到房屋建才发现地基不稳,就来不及了。他认为普通教育的宗旨,并不仅仅是让学生变得“有用”,而是要让他们“(一)养成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的精神”^③。由此可见,蒋梦麟和蔡元培对教育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

另外,蒋梦麟还把职业界分为“自动的”和“机械的”两种人才。前者具有远大的目光、进取的精神和“事事图改良,着着求进步”的作风;后者则是只“具一艺之长,精一部分之事。人先提倡,我能随之”^④的人。他提出高等专门学校要培养自动人才,使之成为工业社会的领袖,中等职业学校则应该培养机械人才,为工业社会培养优秀工人。

4. 个人与社会

蒋梦麟认为,共和国的作用,就是尊重并保护个人价值;教育的目的,则是发展个性,培养特长,进一步增加个人价值。为此,就必须对教育学有所研究。他指出,作为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学科,教育学分为个人与社会两大部分:就个人而

① 《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22~23页。

② 《蔡元培全集》,第3卷,462~463页。

③ 《蔡元培全集》,第3卷,474页。

④ 《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25页。

言,为了满足“发展个性”的需要,它要涉及生理学、遗传学、卫生学、心理学、论理(逻辑)学、美学等学科;从社会来看,为了满足“发展人群”的需要,它又涉及人种学、历史学、地理学、伦理学、政治学、群学等许多领域。此外,无论个人还是社会,都离不开自然界,因此教育学还涉及生物学、动物学、植物学和物理、化学等其他科学。因此他说:“有真学术,而后始有真教育,有真学问家,而后始有真教育家。……无大教育家出,而欲解决中国教育之根本问题,是亦终不可能也。”这里所谓大教育家,显然是通晓各门学科的通博之士,“不通博乎此,则不可以研究教育”。^①

蒋梦麟晚年在回忆北大的学术自由以及蔡元培、陈独秀、胡适和鲁迅兄弟以后,曾谦虚地说:“有人说北京大学好比是梁山泊,我说那么我就是个无用的宋江,一无所长,不过什么都知道一点。因为我知道一些近代文艺发展的历史,稍有空闲时,也读他们的作品,同时常听他们的谈论。古语所谓‘家近通衢,不问而多知’。我在大学多年,虽对各种学问都知道一些,但总是博而不专,就是这个道理。”^②其实,像蒋梦麟这样“一无所长”却“什么都知道一点”的人,才可能是真正的大教育家。相反,让那些“学有所长”的专家当校长,恐怕未必合适。

蒋梦麟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让每一个人“享受人生所赐予之完满幸福”,要享受这种幸福,还需要社会的开明和进步。因此他说:一方面个人生活的丰富程度与社会的开明进步成正比,“社会愈开明,则个人之生活愈丰富”;另一方面,健全的社会又需要健全的个人来组成。他主张社会进步需要具备三个条件:一是社会的文明能天天增加;二是社会的“肚量”能包容新学说新思想;三是大多数人民能具有享受文化的权利,而这种权利又来自教育的普及。与此同时,他认为社会的进步与每一个人密切相关。个人要推动社会进步,首先要有负责任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基础有二:“一曰能行,二曰能思。所谓能思者,养成清楚之头脑,并有肝胆说出其思想。所谓能行者,做事担得起责任,把肩膀直起来,万斤肩(担?)子我来当。夫如是,始能增加文化,生出新思想,致使大多数人民能享文化之权利。”^③记得傅斯年在回忆蔡元培的时候,曾披露过一个细节。当年他曾写过一份匿名揭帖(小字报)挖苦一位同学,蔡先生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表现。胡适一直主张用真名发表文章,也是为了表示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可见,能不能负责任,是检验人与社会进步与否的一个标准。

① 《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32页。

② 《新潮·新潮》,344页。

③ 《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28页。

主持北大

1. 学潮与学风

五四运动爆发时,蒋梦麟还在上海陪同他的老师杜威进行访问。五四之后,蔡元培因发生如此大事,悄然离开北大,委托蒋梦麟主持北大校务。当时蔡先生对他说:大学生是有自治能力的,你可以代表我到学校执行校务。我把一切权力交给你,但是责任由我来负。蔡元培还嘱咐说:“自今以后,须负极重大之责任,使大学为全国文化之中心,立千百年之大计。”^①

与此同时,蔡元培对于学生在运动以后的状态忧心忡忡。蒋梦麟在回忆当时的情况时写道:“他说,他从来无意鼓励学生闹学潮,但是学生们示威游行,反对接受凡尔赛和约中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那是出乎爱国热情,实在无可厚非。至于北京大学,他认为今后将不容易维持纪律,因为学生们很可能为胜利而陶醉。他们既然尝到权力的滋味,以后他们的欲望恐怕难以满足了。这就是他对学生运动的态度。”^②

蒋梦麟接受蔡元培委托后,北大学生会负责人段锡朋、张国焘等人曾拜访过他。张国焘回忆说:“我到达上海后……和段锡朋等到江苏教育会去访问住在那里的蒋梦麟先生,向他表示我们代表北大同学欢迎他去北大代理校长的职务。于是蒋先生也即到达北大,代理校长,肩负起这一艰巨的任务。”^③不久,蒋梦麟与张国焘等人一同乘火车到达北京。顺便说一句,张国焘离开北大后所选择的道路也证明蔡元培的判断无误。

蒋梦麟抵京后,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日刊》发表《蒋梦麟代办北大校务启事》:“元培因各方面督促,不能不回校任事。惟胃病未瘳,一时不能到京。今请蒋梦麟教授代表,已以公事图章交与蒋教授。嗣后一切公牍,均由蒋教授代为签行。校中事务,请诸君均与蒋教授接洽办理。”^④

初到北大时,蒋梦麟面对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评价这场举世闻名、影响深远的学生运动。

7月22日,北大学生集会欢迎蒋梦麟。因为蒋梦麟深知蔡元培“‘为学问而学问’的信仰,植根于对古希腊文化的透彻了解,这种信仰与中国‘学以致用’的思想适成强烈的对照”^⑤,因此他在即席讲演中介绍了蔡元培的近况后说:蔡先生的美德和他集中西文化于一身的精神是“怎么得来的呢?是从学问中得来的。

① 《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145页。

② 《新潮·新潮》,125~126页。

③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一册,6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0。

④ 《蔡元培全集》,第3卷,311页。

⑤ 《新潮·新潮》,119页。

故诸君当以学问为莫大的任务”。蒋梦麟还说,西方先进国家之所以有今天的成就,是多少年来文化积累的结果,“故救国之要道,在从事增进文化之基础工作,而以自己的学问功夫为立脚点,此岂摇旗呐喊之运动所可及”。讲话结束时,他告诫大家:“如果是今天反对这个,明天反对那个……终不是根本办法。吾人若真要救国,先要谋文化之增进。”^①

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蒋梦麟与胡适共同发表《我们对学生的希望》。我注意到,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就对学生运动有看法。这篇由他起草的文章,进一步表达了他们对学生运动的意见。

该文首先肯定了学生运动的贡献有五个方面:一是“引起学生的自动精神”,二是“引起学生对于社会国家的兴趣”,三是“引出学生的作文演说的能力、组织的能力、办事的能力”,四是“使学生增加团体生活的经验”,五是“引起许多学生求知识的欲望”。

紧接着,文章分析了学生运动的起源。作者认为,学生运动起源于变态社会,因为常态社会的政治比较清明,许多社会问题有成年人处理,学生可以安心求学,用不着在其他方面操心。但是在变态社会中,“许多事被一班成年人或老年的人弄坏了,别的阶级又都不肯出来干涉纠正,于是这种干涉纠正的责任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简单一句话:在变态的社会国家里面,政府太卑劣腐败了,国民又没有正式的纠正机关(如代表民意的国会之类)。那时候,干预政治的运动,一定是从青年的学生界发生的。汉末的太学生,宋代的太学生,明末的结社,戊戌政变以前的公车上书,辛亥以前的留学生革命党,俄国从前的革命党,德国革命前的学生运动,印度和朝鲜现在的运动,中国去年的五四运动和六三运动,都是同一个道理”。所以他们认为:“荒唐的中老年人闹下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至于动不动就使用罢课手段,则“是学生运动破产的表现”。^②

为什么这样说呢?这不仅是因为“罢课与人无损,于自己却有大损失”,还因为它容易让学生养成依赖群众的心理,养成逃学和盲目从众等习惯。在这方面,文章的论述非常精彩,不妨摘录其中一段:“现在的学生很像忘了个人自己有许多事情可做,他们很像以为不全体罢课便无事可做。个人自己不肯牺牲,不敢做事,却要全体罢了课来呐喊助威,自己却躲在大众群里跟着呐喊,这种依赖群众的心理是懦夫的心理!”^③时至今日,能够对学生运动作这种分析者,并不多见。

在指出学生运动弊病的同时,蒋梦麟和胡适还向大家指出:今后要注重真正的学生活动,这种学生活动包括学问生活、团体生活和社会服务三个方面。在学

① 《蒋梦麟文化学术随笔》,145~146页。

② 《蒋梦麟文化学术随笔》,166~168页。

③ 《蒋梦麟文化学术随笔》,168页。

问生活上,一要学好外文,二要注重观察与调查,三要促进学校的改良,四要注重自修。在团体生活上,除了要开展学术活动、体育活动、游艺活动、社交活动外,还要弥补各种组织活动中不完善的地方,其中包括开会的法定人数、提案手续、发言顺序、表决方法、复决程序、讨论时间等内容,以及容纳反对党的意见和人人要负责任的精神。在社会服务上,要注意普及科学常识和公民常识,开展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活动。这一切,都是民主社会不可缺少的内容。

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尽管这篇文章说理透辟,但在那变态社会向常态社会转轨的时代,大大小小的学潮还是此起彼伏,一个接着一个。有一次,学校要收讲义费,学生马上举行集会表示反对。当时蔡元培已经回校,他赶到现场,气愤地卷起袖子喊道:“你们这班懦夫!……有胆的就请站出来与我决斗。如果你们哪一个敢碰一碰教员,我就揍他。”^①后来,蒋梦麟也经历了多次围攻,甚至在办公室里被关了几个小时。

为什么“学生势力这样强大而且这样嚣张跋扈”呢?蒋梦麟认为这与他们的出身有关。他说:“这些学生多半是当时统治阶级的子女。学生的反抗运动,也可以说等于子女对父母的反抗。”另外,“学生运动在校内享有教师的同情,在校外又有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的支持,因此势力更见强大”。^②蒋梦麟还说:许多事例“足以说明学生运动中包含各式各样的分子。那些能对奋斗的目标深信不疑,不论这些目标事实上是否正确,而且愿意对他们的行为负责的人,结果总证明是好公民,而那些鬼头鬼脑的家伙,却多半成了社会的不良分子”^③。

尽管如此,蒋梦麟对于当时的学生爱国运动还是给予热情支持。比如“三·一八”惨案发生后,蒋梦麟多次出席“北京国立九校校务讨论会”,处理善后问题,并严厉谴责政府屠杀学生的暴行。

2. 自治与“治自”

蒋梦麟一生始终把教育与改变人生态度、培养合格公民联系在一起。他虽然对学潮多有批评,但还是把五四运动比作中国的文艺复兴,希望以此为起点,“把中国萎靡不振的社会,糊糊涂涂的思想,畏畏缩缩的感情,都一一扫除”^④,使每一个人都成为活泼泼的公民。1919年北大发生林德扬自杀事件,五四运动中的学生领袖罗家伦认为这是恶劣的社会造成的悲剧。蒋梦麟认为,除了社会原因之外,这也是中国人心气薄弱的表现。为此他撰文说:“中国之社会,一罪过之社会也。中国之家庭,一罪过之家庭也。以罪过之社会,建神圣之国家,犹设天堂于地狱。”因此,“泛言改革政治,其效必浅。泛言改革社会,其祸必巨。欲图积

① 《西潮·新潮》,132页。

② 《西潮·新潮》,136页。

③ 《西潮·新潮》,133页。

④ 《蒋梦麟学术文化随笔》,48~49页。